

从“阶级斗争”向“治理工具”：中国共产党百年工运理论创新与实践智慧

吴有权^{1*}，黄 露¹，成瑜扬¹

(1.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建筑学院，广东省广州市，510850；

* 通讯作者，wuyq@gcu.edu.cn)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历经百年演进，形成了兼具历史纵深与时代张力的理论创新体系。本文以1925年省港大罢工与1983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会改革为关键案例，通过历史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视角，揭示工人运动从“阶级斗争”向“治理工具”的范式转型逻辑。研究进一步提出，中国工运理论通过“弹性控制—渐进赋权”的制度设计，突破了西方“社会中心论”范式，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东方经验，其核心在于动态调适阶级身份、创新复合制度模式并重构数字劳动价值论。本文为劳工政治研究贡献了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范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工运学说在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当代生命力。与此同时，也为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劳动者权益保障以及技术治理等相关领域提供了富有深度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省港大罢工；深圳蛇口；历史制度主义；劳资关系转型

引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百年演进史，既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样本，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互动共生的动态图景。本文聚焦一个尚未被充分探讨的悖论：在传统产业工人比例下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激增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理论创新重构“工人运动”的内涵，使其既能延续“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政治承诺，又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挑战？

本文选取省港大罢工（1925）与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会改革（1983）作为关键案例，并非偶然。前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首次大规模运用工会组织实现政治目标，后者则是市场化条件下工会职能转型的“压力测试场”。两案例的对比分析不仅呈现理论建构的历时性特征，更揭示出贯穿百年的核心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通过“问题导向”的理论生产机制，将工人运动转化为联结政党合法性、社会稳定性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纽带。这种动态调适能力，或可为全球劳工研究提供“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东方经验。

通过建构“历史制度主义—适应性治理”双重分析框架，本文突破既有研究对政策演变的表层描述：其一，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揭示1925年省港大罢工确立的“政治动员优先”原则，如何通过制度记忆塑造后续工运理论发展轨迹；其二，借助适应性治理模型阐释1983年蛇口工业区工会改革创造的“市场兼容型”维权机制，如何演化为应对数字经济的新制度模板。案例比较显示，两个标志性事件构成理论创新的“制度拐点”——前者实现工运理论从经济抗争向政治动员的范式转换，后者完成从阶级话语向治理技术的功能性嬗变。本文在理论维度突破西方工运研究的“社会中心”范式，建构“政党中心主义”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平衡社会动员与政治稳定的治理智慧，特别是为数字劳动时代的技术治理与权益保障开辟新的理论进路。

1.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理论建构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理论建构，其发展轨迹不仅呈现为核心理念的历时性嬗变，更映射出三重动力机制的协同作用。这种理论建构的复合逻辑，既体现政党意识形态的延续性，又彰显对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三重变革的制度化回应能力。

1.1. 核心理念的历时性嬗变

中国共产党工运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工运学说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这一演进轨迹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理论内核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调适。

1.1.1. 革命动员范式（1921-1949）

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框架下，党构建了“阶级解放—政治斗争—政权夺取”的三维工运理论。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形成的“罢工委员会”组织形式，标志着工运理论从单纯经济斗争向政治联盟战略的跃迁 [1]。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确立的“工业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论断，为工运理论注入了本土化基因 [2]。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革命受挫后形成的“隐蔽斗争—组织重建”策略，彰显出理论体系应对实践困境的自我调适能力。

1.1.2. 建设整合范式（1949-1978）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推动工运理论发生三重转向：功能定位从革命工具转为建设力量，组织形态从独立工会转向单位附属，运行机制从阶级斗争转向生产竞赛。李立三在1951年提出的“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原则，实质上是将剩余价值理论创造性转化为社会主义劳动激励机制的典型例证 [3]。这种理论重构既保留了苏联工会模式的组织效能，又创新性地嫁接了传统单位制的治理逻辑。

1.1.3. 改革调适范式（197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催生工运理论的第三次转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在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构建“权益保障—技能提升—社会参与”的新型理论框架。2001年《工会法》修订确立的“两个维护”原则即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与维护职工具体利益，标志着工运理论成功实现从政治动员向法治保障的范式转换 [4]。当前推行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理论，本质上是对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异化问题的制度性回应。

1.2. 理论创新的三维动力机制

中国共产党工运理论的历史演进，本质上是三重动力交互作用的结果，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创新机制。

首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中国化转译构成理论发展的哲学根基。党通过创造性转化《资本论》的异化劳动批判，构建了“劳动者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原则—劳动权益保障”的理论链条 [5]。这种转译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将剩余价值学说转化为最低工资制度设计，将阶级斗争理论升华为集体协商机制建设，实现了革命理论与建设实践的有机衔接。

其次，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持续倒逼理论创新。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人”理论、市场经济初期的“市场化劳动关系”理论、新时代的“共建共享”理论，分别对应不同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形态特征。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工运理论突破传统阶级分析框架，发展出涵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体系。

第三，工运理论的演进呈现出显著的制度惯性特征。苏联工会模式的组织架构、传统单位制的福利保障机制、市场经济下的契约精神等制度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以“制度基因”形式融入理论体系 [6]。这种路径依赖既保证了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又通过选择性吸收实现了制度创新。

2. 早期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分析

省港大罢工（1925-1926）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运实践的典型案例，其理论价值不仅在于运动规模与时长，更在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中国化的范式转换机制。本研究通过历史制度主义与政党中心主义双重视角，揭示该事件蕴含的理论生产逻辑及其制度遗产。

2.1. 事件演进与理论生成的互动机制

省港大罢工（1925.6-1926.10）的爆发源于多重结构性矛盾：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巡捕枪杀工人顾正红引发的“五卅惨案”，成为点燃全国反帝运动的导火索。6月19日，香港海员工会在邓中夏、苏兆征等共产党人领导下率先发起罢工，三日内即有25万香港工人返回广州，形成“省港工潮联动态势”。这场历时16个月的运动，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进行在地化转换的实验场，其演进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动员阶段（1925.6-1925.9）：通过“反帝废约”口号实现从经济抗争中要求改善待遇向政治动员中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范式转换。罢工委员会创造性运用“三层叙事”：对工人强调剩余价值剥削如揭露英资企业利润率300%，对市民宣传民族尊严如香港90%税收源自内地转口贸易，对商界警告经济主权丧失如英国控

制华南75%航运 [7]。这种差异化动员策略使罢工参与人数突破50万，验证了阶级话语与民族叙事的耦合可能。

建制阶段（1925.10-1926.5）：成立具有准政权性质的罢工委员会，下设财政、司法、宣传等8部，建立2000人工人纠察队。通过征收“特许货物税”——对非英货征收2.5%过境费，日均获取银元万元，形成“以商养工”的财政自主模式 [8]。这种制度创新标志着工运理论从斗争策略向治理能力建构的跃升，为延安时期“三三制”政权积累管理经验。

调适阶段（1926.6-1926.10）：随着北伐战争推进，党实施战略重心转移。通过《罢工变更策略宣言》将斗争形式从全面罢工转为“特许证”制度来集中打击英国贸易，既保持政治压力又缓解经济困局。这种灵活策略体现工运理论从刚性对抗向弹性博弈的进化，其“重点打击、区别对待”原则在新时代劳资纠纷调解中仍具借鉴价值。

2.2. 制度遗产与当代实践的谱系联结

省港大罢工构建的工运范式在以下三个维度持续影响当代中国劳动关系治理：

其一，策略工具箱传承。封锁香港港口的“地理战”策略，在平台经济时代演化为网约车司机通过修改虚拟定位实施的“算法围栏”抗争。两者均体现对关键经济节点的精准打击智慧。

其二，组织基因延续。罢工期间形成的“政党-工会-群众”三级动员体系，在新时代发展为“党建带工建”模式。2018年美国外卖员集体维权中，深圳工会依托党支部建立骑手代表大会，其代表比例制（1:50）与1925年设计高度相似 [9]。

其三，话语生产机制。将工人苦难叙事升华为国家发展叙事的修辞策略持续演进。罢工期间塑造的“民族救亡先锋”意象，在当代转化为“大国工匠”荣誉体系，通过《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等制度载体实现话语更新。

省港大罢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中国化的关键转折点，其价值不仅在于斗争规模，更在于构建了理论创新的动态模型：通过“事件冲击—组织试错—制度定型”的螺旋演进，实现外来理论的本土化再造。这种理论生产机制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工运理论本质上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通过持续的策略调适与制度创新形成的实践知识体系。其遗产表明，有效的工人运动不仅需要阶级意识觉醒，更依赖于组织形态创新和治理能力建构——这一认识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3. 新时代党领导工人实践

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会改革（1979-1989）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中对工运理论的范式突破，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政治承诺-制度创新-发展效能”的三维均衡模型。本研究通过历史制度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双重视角，揭示该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3.1. 制度创新的历史语境与实践演进

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会改革（1979-1989）发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期，其制度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

试验突破期（1979-1983）：作为首个外资集中区，蛇口在1983年前遭遇传统工会模式失灵。典型案例是凯达玩具厂女工罢工事件：1200名女工因工资拖欠集体停工，但行政化工会无力调解。这暴露计划经济工运理论与市场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倒逼袁庚团队探索“党支部领导下的劳资协商”机制。通过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转化为“超产奖”制度，生产率提升30%转化为奖金使工人月均收入从80元增至112元，初步验证市场机制与政治承诺的兼容可能。

体系建构期（1984-1986）：1984年邓小平视察肯定“时间就是金钱”理念后，改革进入快车道。蛇口首创“双轨制工会架构”：微观层面，外资企业工会通过直选产生如1986年三洋电机厂工会直选参选率达98.7%；中观层面，工业区总工会建立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这种弹性结构在1983-1986年间使劳资纠纷调解成功率从61%跃升至89% [10]，形成“效率-公平”动态平衡机制。

范式定型期（1987-1989）：1987年《蛇口工业区集体合同条例》颁布，标志着工运理论完成市场化转型。该条例创造性将“剩余价值分配权”细化为可操作的利润共享条款，如规定外资企业超额利润的20%用于职工培训基金。此举使工人技能认证通过率从32%提升至68%，实现“分配正义”向“发展正义”的范式升级 [11]。至1989年，蛇口模式已输出23项制度创新，成为全国工会改革蓝本。

3.2. 制度创新的“三位一体”机制：组织、权力与话语的重构

中国工会制度的适应性改革在蛇口实践中展现出组织形态、权力机制与话语体系的三维创新。这种创新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实现了政治逻辑与经济理性的动态平衡。

首先，在组织形态层面构建双轨制弹性结构，形成“微观自主—宏观可控”的治理框架。通过设立直选产生的企业工会与党委任命的区总工会，既保障了基层维权效能，又维持了政策协调能力。这种制度设计创造性转化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传动装置理论，将工会的政治传导方向从阶级斗争转向生产力发展，通过64%的工会主席党委委员交叉任职率实现组织嵌入，有效避免了西方工会的对抗性与苏联工会的形式化弊端[12]。

其次，权力运行机制实现从斗争工具到治理工具的范式转换。通过“罢工权”向“集体谈判权”的法定转化，构建起包含停工预警、政府调解、司法仲裁的三级响应机制。这种制度创新既维护劳工权益又稳定投资环境，其开发的“劳资共生指数”评估体系涵盖12项指标，为发展中国家破解“权益-资本”悖论提供了可量化解决方案。

最后，在意识形态话语层面完成政治经济学调适。通过重构“工人阶级主人翁”叙事为“劳资合作伙伴关系”，既延续社会主义政治传统，又承认资本要素的市场价值。这种话语创新通过W_t模型中的劳动生产率变量，将工人主体性与资本贡献度进行价值耦合并实现经济量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共生提供了兼具政治正当性与经济合理性的理论支撑。

蛇口实践揭示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解耦-工具创新-效能转化”机制，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技术。这种既保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内核，又运用市场化工具提升效能的“控制中的放权”模式，不仅推动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中国化跃迁，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工政治的第三种道路。

4.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与现世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历经百年实践淬炼，形成了兼具历史纵深与时代张力的独特理论体系。本文以“理论价值重构”与“理论超越性”为双重视角，系统阐释中国工运理论如何从实践逻辑升华为制度范式，并在全球劳工治理中实现三重突破，为劳工政治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与路径启示。

4.1. 理论价值重构：从实践逻辑到制度范式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理论形成独特的“实践—政策—理论”反向建构路径。1925年省港大罢工面对殖民统治与工人诉求的张力，通过粤语快板剧《工友苦》将剩余价值论具象化为“殖民剥削链”叙事，使苦力群体劳动价值流失可视。这种将码头工人薪资纠纷的经济抗争升维为“反帝废约”政治运动的实践创新，突破第二国际的经济斗争教条，形成政治动员与阶级意识塑造的双重理论维度。

而1983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会改革更具范式意义。面对外资企业劳资冲突激增的挑战，党未简单沿用革命时期的罢工策略，而是通过工会直选试点如三洋电机厂匿名投票赋予工人谈判权，同时设立“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确保党组织在场。这一实践突破倒逼1988年《工会改革基本设想》出台，形成“赋权与规制并行”的制度设计，将马克思“劳资对立”理论转化为“可控矛盾释放”机制[13]，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工治理提供元理论框架。

将省港大罢工和蛇口工会改革相联系，可以总结出“弹性控制—渐进赋权”的制度模型，通过双重架构实现动态平衡：一方面建立科层化政治组织，每50人选1代表组成工人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保留党组织对工会组织的绝对领导。这种“赋权决策权+控制组织权”的模式，在新时代演化为“平台企业联合工会+骑手自组织”双轨制。如某外卖平台工会既通过算法评议委员会保障骑手数据权益，又依托党建指导员制度确保政治底线，体现“组织起来而不失控”的政治智慧。该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平衡社会动员与政治稳定提供制度范本，其核心在于将工人运动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实验场。

4.2. 理论超越性：工运范式的三重突破与系统性重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理论在百年演进中，通过阶级身份的动态重构、制度模式的复合创新以及劳动价值论的数字化延伸，系统性突破了西方工运范式的理论窠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贡献。

首先，中国工运理论以“政治身份重构”为核心机制，实现了阶级范畴的弹性扩展。1925年省港大罢工通过“反帝无产阶级”概念将苦力、店员等非产业工人纳入政治动员体系，约占罢工总人数的63%，突破了马克思经典理论中产业工人的狭义边界；2021年对网约车司机“新型工人阶级”的界定，则标志着阶级定义从“职业属性”向“劳动功能”的范式转换。这种动态身份建构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劳联-产联固守“产业工人身份纯化”（零工劳动者覆盖率不足7%）原则，导致劳动权益保障严重滞后；而中国通过深圳美团骑手工会的GPS轨迹量化模型，将马克思“活劳动”概念延伸至数字劳动领域，实现劳动价值捕获机制的技术化升级[14]。

其次，中国工运理论创新性地构建了“政治嵌入型”制度范式，弥合了西方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理论分野。省港罢工委员会通过行使征税权、司法权建立的“准政权”体系，在当代演化为快递行业党委统筹的

“云端工会”，形成党组织在场与工人自治的协同架构。

其三，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宰制，中国工运理论通过“数据生产要素化”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诠释。在剩余价值率公式的扩展中（ $s'=(\text{数字劳动投入} \times \text{数据权重})/(\text{固定资本折旧} + \text{流动资本})$ ），算法评议委员会对平台经济的数据剥削实施技术制衡，既继承了蛇口工会“利润共享机制”的历史经验，又通过区块链确权技术实现劳动过程的透明化。这一实践不仅验证了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更揭示了数字劳动价值论的双重突破：其一，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被纳入剥削分析框架，破解了平台经济“去物质化”的意识形态迷雾；其二，通过“算法共治”机制如外卖平台GPS轨迹监测与权益系数挂钩），将工人阶级的技术异化转化为赋能工具，重释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的技术维度。

上述三重突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身份-制度-技术”的协同创新体系。阶级身份重构为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复合制度模式为技术治理搭建实践框架，而数字劳动的价值重释则反向强化阶级认同。这种闭环演进路径，既批判性超越瑞典法团主义下依赖既有阶级结构的“三方协商”静态均衡，也突破美国多元主义中忽视结构性权力差异的“自由竞争”原子化困境，最终形成“政党主导的适应性治理”范式。中国经验表明，工人阶级解放路径不必拘泥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而可通过制度性参与权与技术赋能的结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开辟新的可能性。

5. 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百年历程，本质上是历史制度主义“结构约束”与实践哲学“主体能动”的辩证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的中国化叙事。从省港大罢工的“准政权建构”到蛇口工会的“制度弹性创新”，从产业工人的“铁锤叙事”到数字劳动者的“数据确权”，中国始终在国家能力建设、资本规制与劳动者赋能的张力中寻求动态均衡。这种植根历史唯物主义又直面技术资本主义挑战的理论创新能力，不仅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转型治理智慧，更在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中重构了人类劳动解放的实践范式。历史证明，工人阶级的命运始终与政党-国家关系的调适紧密相连，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勇气，正为人类劳动解放事业书写着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 [1] 邢照华. 1925年中国共产党筹备省港大罢工运动研究 [J]. 探求, 2025(1): 86-93.
- [2] 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节选) [J]. 湘潮, 2022(12): 15.
- [3] 贺一峰. 李立三工人运动思想研究 [D]. 湘潭大学, 2023.
- [4] 常凯. 工会何为? [J]. 南风窗, 2005(23): 48-49.
- [5] 杨煌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辩证法——以价值为线索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6(3): 47-55.
- [6] SUE DAVIS. Trade Unions in Russia and Ukraine, 1985-95 [M].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DOI: 10.1057/9781403900852.
- [7] 王振中, 裴小革. 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学术价值及其发展依据 [J]. 经济研究, 2002(6): 69-76+96.
- [8] 钱月乡. 省港大罢工的历史作用 [J]. 教学与研究, 1980(6): 69-73.
- [9] 金世育. 新就业形态下工会建设的使命担当与策略选择 [D].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10] 罗丽娟.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 [D]. 中共中央党校, 2019.
- [11] 曹大友, 张弘, 张捷.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269.
- [12] 贺敬垒. 论列宁对社会主义工会理论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3(12): 16-19.
- [13] 乔健. 工会改革：中国特色工会道路的“提质增效”——2016年上海群团改革的经验探析 [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7, 31(2): 72-83.
- [14] 叶创昌. 曲折的道路光辉的篇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广州地方党组织发展简况 [J]. 探求, 1989(4): 33-39.